

書名：西湖的彼岸
著者：李歐梵

西湖中的弄潮兒

方知

認為將財產社會化才是經濟自由。如果直接譯為社會主義，就能免除這些觀念上的含糊。

譯文中稍嫌草率處也不少。reformist 譯為「保守主義份子」(二五頁)；doctoral ignorance 譯為「對學術的漠視」(七三頁，意為飽學之無知，只會死填知識無法自知識中吸取智慧與教訓，或可譏諷為「博士文盲」)。六六頁第二段有一句：我們不得不同意托克維爾對民主的分析，認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民主政體肇建之同時，民主文明也創造出了「民主人」(homo democraticus)。缺乏民主人，民主體制就像農家裏的電冰箱，成為炫耀的裝飾品，從不插上插頭。譯文為：「民主政治是生活的一部份。民主精神是由文化造就出來的，但同時它也是民主團體的精髓。沒有這種精神的民主團體，就好像……」。不但把民主政治大理論家托克維爾的名字略去，democratic institution 譯成民主團體更是不通之至。至於，把 find their roots 譯成「掘出自己的根」(四五頁)，the dawning of a new era 譯成「新時機的消逝」(一一頁)則與原意剛好相反。

綜觀申先生的譯本，文筆尚稱通順流暢。如果譯者能够不偷懶，把被刪除的地方補進去；能够以嚴肅的態度翻譯，疑難處質諸高明，將錯誤的地方全部修正過來，那麼此譯本的可讀性就更高了。

這是一本名實不相符的文集，光從書名和前言來看，讀者會以為作者在歷經西潮的浮沉後，已然已經深悟西方文化種種不對勁的具體所在，同時也已認識到中國文化具體的可愛之處，但是在一一展讀書中各篇後，抱這一期望的人就會發覺作者還無能於達到這種境界；甚且，作者在前言中自認「回頭是岸」，已經到了西潮的彼岸，換句話說，已經脫出西方文化的籠罩，再也不會為之所役，然而細心明白的讀者當會看出作者如不是在欺人，便是自欺而不知覺。

作者說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危機」（前言），但是翻遍全書，除了「語言與沉默」中介紹史丹納指斥近代西方非人性化的野蠻文化以外，再也找不出作者看到的是什麼樣的西方文化危機。至於所謂的中國文化，如果把尺度放得很寬，除了「日本遊記」、「撒爾斯堡音樂節」、「詩的電影」等少數幾篇以外，其餘各篇都或多或少的觸及到這個問題，但是這些觸及往往情緒性的悲悼多於認知性的肯定，比如：「這種浪漫的『心路歷程』，在中國可謂淵源已久，……，我們這一代，在情感上都是西潮衝擊下的『罪人』，唯有夏濟安先生才是中西交流中的『聖徒』。」（浪漫的聖徒），「在這個『非常』的時代談『孝道』，實在是一件難事，……，然而，我有時仍會對這一個大規模的『倫理悲劇』而淪然淚下。」（為婚姻大事上父母親書），「老殘畢竟是遨遊中國的領土，……然而這種悲哀的背後是歷史、是文化，在這個西潮洶湧的時代，看劉鶚書中的意境，真是恍如隔世了。」（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這類情緒性的悲悼，書中隨處可見。除了顯示作者對當前中國文化的處境只圖耽溺於一己情感

的折騰起伏外，同時也暴露了作者遇事只能自哀自憐的心性。

何以只圖耽溺於一己情感的折騰起伏和只能自哀自憐？因為作者是個不折不扣的個人美感情調的追求者，這主要在「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踪徑」、「徐志摩的朋友」、「奧國的飄零」、「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浪漫的聖徒」、「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撒爾斯堡音樂節」、「詩的電影」等篇中特別可以看出，而且，作者所追求的美感情調還是屬於低調、灰調的，既如此，作者在面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及西方知識文化的評介時，所能採取的唯一角度，就是這一個既低且灰的個人美感情調。在「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一文裏，作者雖然也曾提及這些浪漫文人的只顧專注一己生活美感情調的追求，以致與社會大眾脫節，產生苦悶感，但是相隨在這些描述的前前後後，看不到應有的指責與恰當的批評，反而多的是用來開脫的解釋，以及私心所在的讚賞——如科舉制度的廢除與現實環境的惡劣，使得他們參與無門；而他們火般的浪漫則使新中華重生，為中國帶來一番新氣象。這樣的態度其實不難瞭解，因為作者隱然也是生不逢時的浪漫者，不但其浪漫的嗜好與徐志摩、郁達夫等人不相上下，在時不我予的感受強度上則更有過之，「但是這個浪漫主義的英雄時代早已逝去了，在六十年代的社會，不僅外在的現實不允許浪漫英雄的產生——婚姻早已自由，戀愛已成濫調，個人的行為不能掀起社會上的狂風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這一代的心理架構上，現實世故、小心，早已築就許多感情的提防，窒息了年青的浪漫熱情。」（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踪徑、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隨着作者有意無意的認同了五四時代的浪漫文人，就難怪字裏行間盡是沒落王孫的飄零感了。

個人美感情調的追求者，不但在面對中國歷史文化時受制於一己美感情調的左右，在面對西方歷史文化時，同樣也惟有聽命於一己美感情調的指揮，所以作者說自己已然到達西潮

的彼岸，脫離西方文化的掌心，但是從本文集的內容看來，這不過是作者的自說自話罷了，根本沒這回事。肯定作者仍然在西潮中載浮載沉，除了看不到對西方文化的反省與批評外，作者眉飛色舞的以一己的美感情調來介紹西方文化，就是司馬昭之心的顯示；一個身居海外又是鑽研中國近代史的中國文人，如果有起碼的民族意識和歷史良心，絕不會對近代中國的苦難無所動容，更不會對造成這些苦難的西方勢力一無指斥，尤其作者口口聲聲文人的 Engagement 與 Commitment，既要 Engagement，要 Commitment，就該有立場，有擔當，但是綜觀全書，不惟見不到對苦難的悲憤之情與對苦難造就者的痛切，以及應有的奮發之道，反而無立場的大談西方的音樂、電影與風景，大量的推銷一己的飄泊感，零餘感，這不是棄立場與擔當於不顧，十足受制於個人唯美低灰情調的追求是什麼！以一個鑽研中國近代史，自稱在西潮中浮沉已久，對西方文化危機終於有所認識，如今已懷抱回頭是岸心境的中國文人，其所謂的有所認識，回頭是岸，竟然僅是這一些不成情懷的情懷，則何意義之有！

總之，不管自覺也好，不自覺也罷，作者誠然是一個為西潮的浪濤所席捲而去猶未上岸歸來的人，尤其，不但作者文中盡是表白西潮浪花之美，就如同許多所謂的海外學人一樣，作者個人躍身西潮而流連忘返不說，還要與緻勃勃的鼓動唯美的西潮來衝擊國內的人，像這樣的西方唯美推銷者往往振振有詞的挾「刺激」、「啓發」、「比較」等等美名，大行其販賣西方唯美文化的伎倆；不錯，自我封閉誠然不足取，但是對西方文化的評介，如果假手於如此不具立場，無所認識的人士，其後果的堪慮是不問可知的。要洞識西方文化的是是非非，並不一定要有過人的眼光不可，真正的關鍵還在本身立場的執着與認識的清楚，舉個例子說：初抵美國的人，眼光所及盡是高度工業化自動化的社會，彷彿人間美好盡在此矣，但是

仔細追究，不難認識到這裏面存在着兩個大問題，一是污染的無所不在終將危及一己的生存環境，另一則為能量的過分浪費剝奪了他人的生存需要，尤其以佔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來消耗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總能量，其無視於其他地方十億左右饑餓人口的存在事實，更為不可原諒。

作者除了從一己的美感情調追求出發來推銷西方文化唯美的一面，同時更念念不忘的，是散佈一己的飄泊感與零餘感，而美其名曰「心路歷程」。在「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的前記裏，作者道出這些書「並不一定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或對我的一生有什麼重大的影響，而是當我在人生的旅程，在不同的時期心中常有不同的感受，於是偶然讀到一本書，却把我這種心情或思緒一語道破，現在回想起來當然令人難忘。」這三本書的最後一本是「老殘遊記」，作者讓「老殘遊記」所道破的心情或思緒也當是最為晚近，作者雖然強調「三十歲一過，不管別人說你怎樣年輕，自己心裏是明白的：遲早步入中年了，心境與前也有顯著的不同了。」果真不同了？綜觀這部分近四千字的告白，端的是「讀後不禁百感交集，不忍釋卷」，這些交集而來的「百感」，其實仍然和往昔所寫的各篇一樣，總歸是飄泊感和零餘感，試看「他飽學經貫，又學得醫術，目的當然是在濟世，然而却生不逢時，又如何濟世救民？」「這是一個『非英雄』『非浪漫』的時代，我們又如何做『遊俠』？」「我在去夏三度遊歐的時候，在巴黎的咖啡店裏，在馬德里的街頭，在格蘭納達的山頂上，也偶而想起老殘，和這部『新老殘遊記』，當時所感到的是一種強烈的『荒謬』意味：試問世上還有比在西班牙的鬪牛場中追思白奴唱書——『拔了一個尖兒，拋入天際』——更荒謬的事嗎？在『西潮』中重悟中國文化，也竟有如此的困難。」如果作者不是在立場的執着上根本虛空，在責任的擔當上十足軟弱，何以所發抒的盡是哀哀自憐的傷感？何以盡是由缺乏 Commitment

而來的零餘感？個人一己耽溺在生不逢時的哀憐中自吟自唱倒也罷了，所腐蝕的還只是個人一己的心身，但是如果偏要發之爲文，就讓人不明白是想要博取衆人同情的眼淚，一起唏噓傷感一番呢？還是在昭告國人唯有這樣的調調，才足以代表海外知識分子所謂的文化認同問題，才足以顯示「我輩」的追尋自我？如果不幸有後者的成分，這樣的認同與追尋，未免太廉價而一無是處了。

飄泊感與零餘感的產生，是作者自己「跟進」徐志摩、郁達夫等一千五四時期浪漫文人的必然後果，也是作者在西潮中浮沉不已終致認識不清、放棄責任的必然現象，除非作者痛切省悟，徹底揚棄個人美感低灰情調的追求，確實了解自哀自憐的傷感不足以成 Commitment，否則，作者終究還會是西潮浪濤中的弄潮兒，到頭來，恐怕不免於覆滅之痛吧！

鳥飛戾天，魚躍于淵

李瑞騰

書名：彩色書法

著者：史紫忱

出版者：中華博物館

中華書法是一種空白藝術，全憑筆墨的優美點線活動以及黑白對比所呈現的空間立體感，來引發欣賞者各種不同的情緒反應。